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战争与和平（下）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张捷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战争与和平 (下)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张捷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下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张捷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05-7642-8

I. ①战… II. ①托…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9464 号

书 名 战争与和平 (下)

责任编辑 王 绵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29.5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642-8 / I · 271

定 价 4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三部 / 971

第四卷

第一部 / 1098

第二部 / 1158

第三部 / 1208

第四部 / 1260

尾声

第一部 / 1322

第二部 / 1383

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 / 1425

译后记 / 1434

第三部

一

运动的绝对连续性，是人的智力不能理解的。对一个人来说，任何运动的规律只有当他从这运动中任意抽取若干单位加以考察时，才变得可以理解。但是与此同时，人类的大部分错误是从把连续不断的运动任意地分为不连续的单位的做法中产生的。

众所周知，古代人有一个所谓的诡辩，说的是阿喀琉斯^①虽然行走的速度为乌龟的十倍，但是永远追不上在他前面爬行的乌龟，因为当阿喀琉斯走完他与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就会在他前面爬这距离的十分之一；而当阿喀琉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向前爬了百分之一，照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个问题在古代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答案（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荒谬是由于任意地把运动分为不连续的单位，而阿喀琉斯和乌龟的运动却都是完全连续的。

我们采用运动的愈来愈小的单位，只能接近问题的答案，但是永远不会得到它。只有假设有无穷小的数值和由它开始的到十分之一的级数，并取得这个几何级数的和，我们才能得到问题的答案。数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获得处理无穷小的数值的技术后，如今在运动的其他比较复杂的方面也能解答以前觉得是无法解答的问题了。

数学的这一古代人所不知道的分支，在考察运动的问题时，假设

① 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善行走，有“捷足的阿喀琉斯”之称。

有无穷小的数值的存在，即运动的主要条件（绝对的连续性）借以恢复的数值的存在，从而纠正了人的头脑由于考察运动的个别单位而不考察连续不断的运动而不能不犯的错误。

在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时，情况也完全一样。

人类的运动是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产生的，是连续不断的。

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是历史学的目的。但是为了理解人的所有任意行为的总和所产生的连续不断的运动的规律，人在思想上假设有任意的和不连续的单位的存在。历史学的第一个方法是从连续不断的事件中任意抽取一个系列，将其与别的系列分开来进行考察，其实任何事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开端，永远都是一个事件产生于另一个事件。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把沙皇、统帅的行动作为人们的任意行为的总和来考察，而人的任意行为的总和从来不通过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

历史科学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常常采用愈来愈小的单位来进行考察，力图用这种方法接近真理。但是不管历史采用的单位如何之小，我们觉得，如果假设有与其他单位分开的单位的存在，假设某种现象有其开端，假设所有人的任意行为是通过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那么这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历史学的任何结论，无须批评者费一点气力就化为乌有，不留一点痕迹，这只是由于批评者把一个或大或小的不连续的单位选作考察的对象；批评者永远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所取的历史单位总是任意选择的。

只有假设用来观察的是无穷小的单位——历史的微分，即人们的同类的爱好，并且掌握积分（求这些无穷小之和）的技术后，我们才有望认识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的头十五年，欧洲出现了数百万人不同寻常的运动。人们放下自己平常做的事，从欧洲的一边奔向一边，抢劫，互相残杀，欢庆胜利和陷入绝望，生活的进程几年内发生了变化，出现一种强烈的运动，它始而不断高涨，随后逐步减退。这个运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进行的？——人们常常这样问。

历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我们讲述巴黎的一座大楼里几十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把这些言行用“革命”一词来称呼；然后详细讲拿破仑以及某些对他抱同情和敌对的态度的人的传记，讲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最后说：这就是这个运动的起因，这就是它的规律。

但是人的理智不仅不相信这种解释，而且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解释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作这样的解释时把最微弱的现象当作最强有力的现象的原因。是人们的任意行为的总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正是这些任意行为的总和使革命和拿破仑一时得以存在，后来又将其消灭。

“然而每一次，只要有征服的行动，就有征服者；只要国内发生大的转变，就有大人物。”历史这样说。而人的理智回答道，不错，任何时候只要出现征服者，就会有战争，但是这并不证明征服者是发生战争的原因，并不证明可以在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找到战争的规律。每一次，当我看见自己的钟的时针走到了十点的地方时，我就听到隔壁的教堂里开始鸣钟，但是我无权根据每次时钟走到十点时就响起钟声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时针的位置是教堂的钟声响起来的原因。

每一次，当我看见机车开动时，我就听见汽笛的声音，看见阀门打开和车轮转动起来，但是我无权由此得出结论说，汽笛的声音和车轮的转动是机车开动的原因。

农民们说，暮春刮寒风是因为橡树长新叶了；确实，每年春天橡树长新叶时都刮寒风。但是，我虽然不知道橡树长新叶时刮寒风的原因，我不能同意农民们把刮寒风的原因说成是橡树长新叶，理由只有一点，即风力不受长新叶的影响。我看到的只是在任何生活现象中常见的某些条件的巧合，并且看到，不管我如何仔细地观察钟的时针、机车的阀门和轮子以及橡树的叶芽，我仍找不出教堂钟响、机车开动和春天刮风的原因。为达到此目的，我必须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察点，研究蒸汽、教堂的钟和风运动的规律。历史学也应该这样做。这样的尝试已经做了。

要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把沙皇、大臣和将军们放在一边，而去研究指导着群众的同时的、无穷小的因素。谁也不能说，用这种方法能使人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历史规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能琢磨出历史的规律，而人的理智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只有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帝王将相的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看法上所花力气的百万分之一。

二

欧洲十二个民族的军队侵入了俄国。俄国军民避免交锋，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波罗金诺。法国军队前进的速度不断增大，直奔它的目标莫斯科。它在快要接近目标时前进尤为迅速，如同下落的物体快要接近地面时加大了速度一样。一个饥饿的、敌对的国家几千俄里的国土留在了背后，而在前面距离目标还剩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感觉到这一点，这支侵略军似乎单凭一股冲力在自然而然地向前推进。

在俄国军队里，在不断后退的过程中仇恨敌人的情绪愈来愈高涨，部队在后退时集中起来，实力增强了。在波罗金诺附近进行了交锋。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被打垮，但是俄国军队在交锋后必然会立刻后退，正如一个球与另一个以更大的速度朝它冲来的球碰撞后必然会弹回来一样；而那个快速冲过来的侵略者之球（虽然在碰撞中已失去了全部力量）也必然会再滚一段距离。

俄国人退了一百二十俄里——退离了莫斯科，法国人进了莫斯科，在那里停下来。在这之后的五个星期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一次战斗。法国人停在那里不动。他们像一头受了致命伤、流着鲜血和舔着伤口的野兽一样，在莫斯科停留了五个星期，什么事也没有做，突然无缘无故地往回跑：奔向卡卢加大道（在打胜仗后，小雅罗斯拉韦茨附近的战场又为他们所控制），没有再打一次大仗，更快地地逃回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逃到维尔纳，过了别列津纳河，再

继续往回跑。

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将士都相信波罗金诺会战打赢了。库图佐夫就是这样报告皇上的。他下令作进行新的战斗的准备，以便彻底击溃敌人，他这样做并不是要欺骗任何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被战胜了，这个战役的每一个参加者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在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接二连三地传来伤亡空前惨重、损失了一半军队的消息，这样再要进行战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

在情报还没有收集，伤员还没有送走，弹药未得到补充，阵亡的人数还没有统计，还没有派新的指挥官去代替战死的人，官兵还没有吃饱睡足时，是不能发起新的战斗的。

而与此同时，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以仿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冲力）自然而然地朝俄军推进。库图佐夫曾想在第二天发起进攻，全军也希望这样做。但是要发起进攻，只有这样做的愿望是不够的；需要有这样做的可能，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不能不后退一程，接着同样不能不再退第二程，第三程，最后，到九月一日——这时军队已到了莫斯科——尽管部队士气十分高涨，但是实际情况要求这些部队退离莫斯科。于是部队又退了一程，退了最后一程，放弃了莫斯科，使它落到敌人手里。

有的人习惯于认为，战争和战役的计划是统帅们用这样的方法制订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看着地图考虑如何部署这次或那次战役一样；这些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这样做和那样做，为什么他没有立刻退向卡卢加大道，放弃莫斯科，等等。习惯于这样想的人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有其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统帅的活动完全不像我们自由自在地坐在书房里分析某次战役时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分析时看着地图，双方的兵力是知道的，地形也是知道的，而且是从某个已知的时刻开始考虑的。一个总司令在某个事件**开始**时，从来都不处于我们考察这事件时已知的条件之中。总司令总是处在一系列变动着的事件的中间，因此他任何时候，任何时刻都不能全面地考虑到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

意义。事件不知不觉地、一刻不停地呈现出本身的意义，而在事件的这个接连不断的呈现过程的每一个时刻，总司令总是处于最复杂的玩弄权术、阴谋、操心、各种依赖关系、权力、方案、建议、威胁、欺骗的中心，经常必须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通常是相互矛盾的问题。

军事学家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到达菲利之前早就应该把军队调往卡卢加大道，甚至有人提过这样的方案。但是摆在总司令面前的，尤其是在困难时刻，常常不是一种方案，而总是同时有几十种。而这些根据战略和策略制订的方案，都是相互矛盾的。看来总司令应做的事只在于从这些方案中选择一个方案。但是就连这一点他也做不到。事件和时间是不等待人的。假定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加大道，但是这时一个副官骑着马从米洛拉多维奇那里跑来问道，现在是向法国人开火还是撤退。他需要立刻就下命令。而命令撤退会使我们不再拐向卡卢加大道。在副官之后军需官紧接着前来请示粮草运往哪里；军医院院长来问伤员往哪里送；彼得堡来的信使送来了皇上的信，说不允许放弃莫斯科，于是总司令的竞争对手，即在暗中拆他的台的人（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常常有好几个）便提出与转移到卡卢加大道的计划完全相反的方案；总司令体力消耗很大，需要睡眠和吃点东西；可是一位没有得到奖赏的可敬的将军前来向他发牢骚，居民则来寻求保护；派去观察地形的军官回来向他报告，说的与在他之前派去的军官所说的完全相反；而侦察员、俘虏和进行现地侦察的将军对敌军情况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那些习惯于不理解或忘记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必然会遇到的这些条件的人，在向我们介绍，譬如说，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设想总司令在九月一日能够完全自由地解决关于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可是当俄国军队到了离莫斯科五俄里时，这个问题已不可能存在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附近，是在斯摩棱斯克城下，最明显的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附近，是在从波罗金诺撤退到菲利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决定的。

三

俄国军队从波罗金诺撤退后，驻扎在菲利附近。视察阵地回来的叶尔莫洛夫策马到了库图佐夫元帅面前。

“在这阵地上作战是不可能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朝他看了一眼，要他把话再说一遍。他说完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把手伸给我，”库图佐夫说，把他的手翻过来摸他的脉，又说道：“你有病，亲爱的。好好想一想你说的是什么。”

库图佐夫在俯首山上，在离多罗戈米洛沃门六俄里的地方下了马车，在路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将军。从莫斯科城里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参加到他们之中。所有这些杰出人物分成几堆，相互之间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设想中的计划、莫斯科的局势以及一般的军事问题，大家都感觉到，虽然并没有说明叫他们来开军事会议，但是这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会议。大家谈论的都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谁谈论或打听私人的事情，那么只低声地说几句，立即又转回到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在所有这些人中间没有人说笑话，听不见笑声，甚至看不见微笑。显然，所有的人都努力使自己的举止与他们的地位相称。每一堆人在交谈时，竭力靠近总司令（他坐的凳子仍然处于这几堆人的中心）尽量把话说得使他能够听见。总司令听着，有时再问一遍他周围的人说的话，但是自己没有参加谈话，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在听了某一堆人的话后，大多带着失望的神情——仿佛他们说的完全不是他希望知道的——转过头去。一些人谈到选定的阵地时，批评的主要不是阵地本身，而是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证明说，错误在这之前已经犯了，应该前天就应战；还有一些人谈到萨拉曼卡战役，他们是听刚来的穿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①说的。（这个法国人和

^① 克罗萨是法国侨民，经常变换服役地点。1812年到了俄国。

一个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一起，分析了萨拉戈萨的被围^①，认为也可以这样保卫莫斯科。)拉斯托普钦伯爵在第四堆人当中说，他准备同莫斯科民兵一起战死在莫斯科城下，但是他仍然不能不为自己不了解情况表示遗憾，要是他事先知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第五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战略考虑的深度，谈论军队应朝哪个方向运动。第六堆人说的纯粹是废话。库图佐夫的脸色变得愈来愈忧虑和阴郁了。他从所有这些谈话中看到一点：保卫莫斯科确实实没有任何实际的可能，也就是说，这完全不可能，如果有一个发疯的总司令下令进行战斗，那么会出现混乱，仗仍然打不起来；仗打不起来是因为所有高级指挥官不仅认为这个阵地不中用，而且他们在谈话中讨论的只是这个阵地无疑会放弃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指挥官怎么能把自己的部队带到他们认为不能打仗的战场上去呢？下级指挥官，甚至士兵（他们也在议论）也认为阵地不中用，因此不能在相信必败无疑的情况下去打仗。如果本尼格森坚持要守住这阵地，而其余的人尚无定见，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只能作为挑起争论和搞阴谋的借口。库图佐夫明白这一点。

本尼格森选定了立场，使劲地显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热情（库图佐夫听他这样说时不能不皱眉头），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对本尼格森的目的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守不住，就把过错推给库图佐夫，说他不战而退，把部队带到了麻雀山；如果守住了，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如果他的意见遭否决，就可为自己洗刷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是现在老人对这个耍阴谋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他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他所考虑的这个问题是：“难道是我让拿破仑到了莫斯科，我是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在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的时候？或者是在前天晚上我打起瞌睡来，命令本尼格森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些？……然而是在什么时候，在什

① 萨拉戈萨是西班牙城市。1808年到1809年，曾两度被法国军队围困，1809年2月，在经过两个月的英勇抵抗后陷落。

么时候决定这件可怕的事的呢？莫斯科应当放弃。部队应当撤退，应当发布这个命令。”他觉得发布这个可怕的命令就像放弃军队的指挥权一样。况且他喜欢权力，习惯于掌权（在土耳其时，他曾是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部下，那位公爵受到的尊敬使他很羡慕），并且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拯救俄国，只因为这一点，他才在违背皇上的意愿的情况下顺应民心被选中当了总司令。他还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在这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指挥军队，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毫不畏惧地把不可战胜的拿破仑看作自己的敌手；于是当他一想起他应当发布的命令时就感到可怕。但是应当作个决定，应当打断他周围的人的谈话，因为这些谈话开始变得太自由放任了。

他把几位职位较高的将军叫到自己跟前。

“不管我的头脑是好是坏，再也没有什么人可帮一把的了。”他说，从长凳上站起来，前去菲利，他的马车停在那里。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亚诺夫的一座最好的宽敞的木房子里召开会议。这个农民大家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挤在门廊那边的杂房里。只有安德烈的六岁的小孙女玛拉莎留在大房子的火炕上，殿下很喜欢她，在喝茶时给了她一块糖。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屋来，在放在上座^①处圣像下面的宽长凳上坐下，玛拉莎从火炕上又胆怯又高兴地看着他们的脸、身上的制服和佩戴的十字勋章。而爷爷本人，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离开他们单独坐在阴暗角落的炉子后面。他的身体深深陷进折叠的圈椅里，不断地发出呼哧声和抻着军服的领子，虽然领扣是解开的，但是他觉得仍然卡着他的脖子。一个接一个进来的人走到元帅面前；他和某些人握握手，朝某些人点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窗户上的窗帘，但是库图

① 上座是俄国农舍中挂圣像的地方，一般作为贵客的座位。

佐夫生气地朝他挥挥手，凯萨罗夫明白了殿下意思，他不希望人们看见他的脸。

在农家的一张云杉木桌子上放着地图、平面图、铅笔和纸张，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太多，于是勤务兵又搬来了一条长凳，把它放在桌旁。刚到的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就坐在这条长凳上。在圣像下面的首席上坐着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格奥尔吉勋章，脸色苍白，带有病态，高高的前额和秃顶连在一起。他寒热病发作已有两天了，这时他浑身发冷和酸痛。坐在他身旁的是乌瓦罗夫，他正在一面很快地做着手势，一面低声地（大家都这样说话）告诉巴克莱什么事。身材矮小和圆圆胖胖的多赫图罗夫扬起眉毛，两手放在肚子上，注意地听着。另一边坐着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用一只手支着他那宽大的脑袋，一双大胆的黑眼睛闪闪发亮，看起来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脸上带着急不可耐的表情，用习惯动作把两鬓上的黑发朝前卷，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进屋的门。科诺夫尼岑坚定、漂亮、和善的脸上挂着亲切而调皮的微笑。他遇到玛拉莎的目光，便向她挤挤眼睛，逗得那小姑娘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家等着本尼格森，这时他借口要再一次视察阵地，还在吃他的那顿美味的午餐。等他到四点等到六点，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开始讨论，人们低声地谈论着别的事。

本尼格森一进屋，库图佐夫就从角落里出来朝桌旁挪动了一下，但只挪到放在桌上的蜡烛照不着他的脸的地方。

本尼格森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战就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还是保卫它？”接着是长时间的冷场。大家脸色阴沉，在一片寂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生气的呼哧声和咳嗽声。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也看着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的脸变得皱巴巴的，好像要哭一样。但是这个场面延续的时间并不长。

“俄国神圣的古都！”他突然生气地重复本尼格森的话说，以此指出这句话的装腔作势。“请允许我对您说，伯爵大人，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把笨重的身体朝前倾。）不能提这样

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我请诸位先生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拯救俄国要靠军队。是应战而冒丧失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有利呢，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有利？’我希望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把身体向后一仰，靠到圈椅背上。）

讨论开始了。本尼格森还不认为他已经输了。他同意巴克莱等人提出的无法在菲利打防御战的意见，满怀着俄罗斯爱国主义热情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向法军右翼实施打击。看法出现了分歧，发生了争论，有人赞成这个意见，有人反对。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拉耶夫斯基对本尼格森的意见表示同意。这几位将军不知是因为觉得在放弃首都前需要作些牺牲，还是出于个人的考虑，似乎并不明白现在的会议并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必然进程，不明白现在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其余的将军明白这一点，把关于莫斯科的问题撇在一边，谈论着军队应朝哪个方向撤退。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面前发生的事，对这次会议有另一种理解。她觉得这只是“爷爷”和“穿长襟衣服的人”（她这样称呼本尼格森）之间的个人的争吵。她看到他们相互说话时都怒气冲冲，她心里是赞成爷爷的。她看见爷爷在谈话中间调皮地朝本尼格森瞥了一眼，在这之后她高兴地发现，爷爷对“穿长襟衣服的人”说了些什么，把他制止住了：只见他突然涨红了脸，生气地在屋里走了走。本尼格森这样激动，是因为库图佐夫分析了他提出的夜里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去攻打法军右翼的建议的利弊，平静地低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能赞同伯爵的计划。在距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通常都是很危险的，战争史可以证明这个看法是对的。例如……（库图佐夫仿佛沉思起来，一面寻找着例子，一面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看着本尼格森。）不妨以弗里德兰战役^①为例，我想，这次战役伯爵记得很清楚，当时……并不太顺利，只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在

^① 见第二卷第二部第十七章注。

离敌人太近的地方重新编队……”接着全场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觉得沉默的时间很长。

讨论重新开始了，但是常常中断，人们都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有一次中断的时候，库图佐夫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打算说话似的。大家都回头朝他看了一眼。

“好吧，诸位！看来要由我来承担后果了。”他说。接着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到桌子旁。“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听见了。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他停了一下）凭我的皇上和祖国赋予我的权力——命令撤退。”

在这之后，将军们开始散了，他们神情庄重，小心谨慎，默默无言，好像参加葬礼后散了一样。

有几位将军用一种与会上说话时完全不同的音调低声地告诉总司令一些什么事。

家里人早就在等玛拉莎去吃晚饭了，她光着两只小脚丫踩着火炕的台阶，背朝外小心翼翼地从高板床^①上爬下来，夹杂在将军们的腿脚之间，溜出门去。

库图佐夫放走将军们后，用胳膊肘支着桌子坐了很久，一直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放弃莫斯科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究竟在什么时候最后定局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做的，是谁的过错？”

“这一点，这一点我没有料到，”他对深夜到他这里来的副官施奈德说，“这一点我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没有料到！”

“您应当休息一会儿，殿下。”施奈德说。

“不！他们将会像土耳其人那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的话，用他圆胖的拳头捶着桌子喊道，“他们也会那样，只要……”

① 高板床是农村木屋里搭在火炕和侧壁之间的木板床。

五

与此同时，在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上，在放弃和焚毁莫斯科的事件上，拉斯托普钦采取的行动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我们似乎觉得他是这个事件的领导者。

这个事件——放弃和焚毁莫斯科——也像军队在波罗金诺会战后不战而退离莫斯科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每一个俄国人，不是根据推论，而是凭我们和我们的父辈心中的感情，就能预料到发生的事情。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各个城市和村庄，在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及其传单参与的情况下就不断发生过后来在莫斯科发生的同样的事。老百姓无忧无虑地等待敌人到来，既不闹事，也不着急，没有把什么人撕成碎片，而是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在最困难的时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当敌人快要到时，居民中最富的人扔下财产走了；最穷的人留下来烧掉和毁掉留下来的东西。

俄国人的心里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认识，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这个认识，还有莫斯科将要被占领的预感，存在于——一八一二年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俄国人心。有些人早在七月和八月初就开始离开莫斯科，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有些人离开时带着所能带走的东西，留下房子和一半财产，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所谓潜在的（latent）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不是用漂亮的言辞，不是用为了拯救祖国杀死孩子等不自然的行动表现出来，而是不引人注目地、简简单单地、发自内心地表现出来的，因此常常能产生最强烈的效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胆小鬼才会从莫斯科逃走。”有人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劝导他们，说离开莫斯科是一种耻辱。他们对被称为胆小鬼感到羞耻，不好意思离开，但是他们仍